

史街背景



知藏出版社

史街背影

度震著

知识出版社

序

范敬宜

历史和新闻是两门不同的学问，又是两门相通的学问。

历史是过去的记录，新闻是现在的记录。

历史是当时的新闻，新闻是未来的历史。

历史是新闻的积淀，新闻是历史的瞬间。

研究昨天的历史，可以了解今天新闻发生的由来和走势；研究今天的新闻，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延续。

所以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以新闻为鉴，可以明因果。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王羲之的历史观。“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是杜牧的新闻观。前者强调的是要把今天发生的新闻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去认识过去；后者强调的是要从以前发生的新闻中去学会把握未来。

于是，出现这样有趣的反差：写历史要求有现实感，写新闻却要求有历史感。

不了解历史，就不善于发现新闻；不了解新闻，就难以理解历史。

新闻工作者不懂历史，便会流于浅薄，容易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历史学者不懂新闻，便会陷于僵化，容易犯机械唯物论的毛病。

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肯定是两者的结合，邵飘萍、戈公振、邹韬奋、邓拓等为其代表；优秀的历史学者也肯定是两者的结合，郭沫若、翦伯赞、胡愈之、吴晗即是典型。

博古方能通今，博古为了通今。

如果没有深沉的历史思考，邓拓就写不出振聋发聩的《燕山夜话》；如果没有清醒的现实观察，吴晗就写不成震撼人心的《海瑞罢官》。

时代多么需要这样“兼美”的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者！可惜的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新闻工作者容易忘记历史，历史学者容易忽视现实。

我过去一再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提高“学养”，历史知识的修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于是，就要提到庹震同志的这本书。

庹震在这部书的后记里说，书名定为《史街背影》，只是想让读者站在历史长街口望一望模糊的历史背影。这是他的谦虚之词，远远不能说明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我以为，《史街背影》应当视为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写出来的通俗、简要的“史论”。

中国史学家有撰写“史论”的传统。最著名的当然是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后又有明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谈迁的《国榷》，清代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和吴乘权等编撰的《纲鉴易知录》等等。这些史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史为镜，总结历代盛衰、兴替、治乱的经验教训以及历史规律，供当代治国借鉴。史论不是史实的客观列叙，重在有明确、精辟的观点，能够起到警策后人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史论的撰写比通史或以古喻今的读史随感难度更大，也更难把握。它不仅要求作者熟悉历史，而且要求能够融会贯通，把治史的科学性、论史的针对性、写史的生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庹震同志丰富的新闻工作阅历帮了他的大忙。他对当代社会的深刻观察和思考，在这本书里得到充分的反映。

庹震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闻工作者。由于曾经和他共事八年，自以为对他已十分了解，而且经常夸奖他的思维敏捷，文笔出众。及至读到这本书稿，我是惊喜交加。惊的是相处这么久，竟然对他在历史方面的研究有如此造诣毫无所知，实在是“失察”加失敬，不能不佩服他的“深藏不露”。喜的是他正在用自己的实践，探索一条学者型新闻工作者的道路，为新闻界如何提高学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几十年来，从毛泽东同志到江泽民同志，都一再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学点历史，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原因说起来无非是搞新闻太忙，没有时间。忙是事实，然而要说忙，庹震可算是够忙的，他哪来那么多读史的时间呢？毋庸细问，都是一点一滴挤出来的，而且不仅要读，还要思，还要写。这耐得寂寞、抗得纷扰的精神，就够人学习的了。

正因为如此，当庹震要我为这本书写点什么的时候，我实在无法推辞。在他面前，我还没好意思用“忙”字来作托词么？

1999年12月27日凌晨



目 录

序	范敬宜	(1)
舜:说君论臣之课		(1)
信陵君:“这一个”与“这一类”		(10)
公孙鞅:血染的基石		(18)
吴起:知音何处觅?		(26)
韩非:死于非命的必然与偶然		(32)
项羽:“败”与“过”		(37)
萧何:有何之难		(46)
陈平:平与不平		(53)
韩信:信与不信		(61)
周亚夫:饿死谁手?		(75)
晁错:有何之“错”?		(80)
王莽:“复古”的背后		(88)
董卓:“懂”与“不懂”		(99)
诸葛亮:事曹会如何?		(107)
李林甫:“媚顺”为谁?		(115)
冯道:“不倒翁”的后评		(120)
宋太宗:“糊涂”后的“聪明”		(129)
王安石:可贵的“早醒”		(135)
范仲淹:为“人”为“官”为“文”		(146)

明景帝：患难与谁？	(151)
张居正：为谁忙碌为谁留？	(158)
严嵩：迟来的末日	(171)
郑和：身后的航海图为何被焚毁？	(178)
雍正：“正”与“不正”	(183)
源与初——读史札记之一	(190)
史与《史》——读史札记之二	(195)
“功”与“过”——读史札记之三	(202)
“虚”与“实”——读史札记之四	(207)
《史》与师——读史札记之五	(211)
“白”与“黑”——读史札记之六	(217)
“古”与“今”——读史札记之七	(223)
“表”与“里”——读史札记之八	(227)
“始”与“终”——读史札记之九	(231)
前与后——读史札记之十	(237)
后记	(240)
修订补记	(244)

舜： 说君论臣之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居高位而率万民，君臣的“合作”理想模式是什么？历朝历代，更新替换的东西很多，而“明君贤臣者谁”的话题总是相当的沉重。如果说刘邦有萧何是幸、唐太宗有魏徵是福，那秦二世有赵高便是灾、宋徽宗有蔡京更是祸。这是从一方面讲的。换一个角度看，范增遇项羽是灾，海瑞遇嘉靖帝是祸。如果再说到一个个弑君戮臣的悲剧，那可惜可叹可悲可恨的事情就太多了。读国史，研究起这“君臣关系”，不能不说到舜帝与大禹、皋陶、伯夷的一次深入的交谈，追根溯源，这几乎是君臣的第一堂课。

划分历史的段落，面对漫长的历史岁月，有多种分法。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科学的划分方法。在中国，在“封建社会”之后，又有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有一种分法，是将中国的历史，分为“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信史时代”。这种分法，不是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语言（口语或书面语）记史的角度，也算一

种套路。按这个分法，“神话时代”，说的是“开天辟地”后的故事，有“天皇”、“地皇”、“人皇”，有“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传说时代”，说的是“黄帝轩辕”、“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半信史时代”，说的是3个王朝，即夏、商、周。这“一大段”，共约一千多年时间，够漫长的了。这个“君臣第一课”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大段”开始前夕，也就是帝舜一朝的后期。这个时候，中国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夏禹的威望正在上升之中。确切地说，这个时候的“君臣”与封建社会的“君臣”还有许多的不同。尽管如此，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君”与“辅臣”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系。

这“君臣第一课”的一幕出现之前，发生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当尧帝在位的时候，洪水滔天，泛滥成灾，大水包围了山岭，淹没了家园，百姓处于危难之中。尧帝十分着急，四处找寻能治理洪水的能人。不少人推荐了鲧。刚开始，尧帝有点犹豫，他对人说：“鲧为人违背命令，摧残同类，不可用。”但是在一些有威望的人的极力推荐下，尧帝还是妥协了，同意派鲧去治水。九年过去了，大地依然是洪水滔滔，不见水患消除。这时，尧帝发现了舜，由舜代替天子管理国政，巡视各地事务。舜对鲧的失职作了处罚，把鲧流放到了羽山，直到鲧死在那里。舜又让人推荐治水的人，大家想来想去，觉得鲧的儿子大禹是这方面的人才。



大禹这个人，实际上是黄帝的玄孙。他为人机敏，品行端正，诚实可靠，办事又勤勉细致，很有威望和号召力。接受了治水的使命后，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他在益和后稷的帮助下，开辟了九州，疏通了九条河道，筑堤修治了九大湖泊，凿通了九座大山。这些惊天动地的举措，使引发洪水的自然地理环境得到了彻底改造，用疏导的办法解决了水患问题。大禹还让益发给民众稻种，让后稷给缺粮的人发放救济粮，因而深得人心。

大禹的作为，令舜十分满意和高兴。他对大禹进行了奖励，还诏告天下，宣布治水大业的成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君臣之间开了一场特别的“谈心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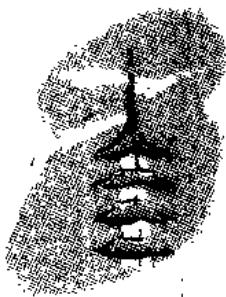
这是《史记》上的一段记述，我们不妨再好好读一读：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

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早夜翊明有家。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绩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驰，行山刊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予欲闻六律五



声八音，来始滑，以出入五言，女听。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谀，退而谤予。敬四辅臣。诸众谗嬖臣，君德诚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

帝曰：“毋若丹朱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
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这段文字，优美而流畅，有现场感，更有亲切

感，可以说从始至终洋溢着一种其乐融融的和谐气氛。

透过君臣的对白中的“警句”，可以感觉到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东西，那就是何为明君、何为贤臣的“标准”，以及为君为臣之道：

——“信其道德，谋明辅和”（果真按道理行事，便会谋划高明，臣下和谐）；

——“知人则智，能言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了解人才，就算明智，这样就能恰当地用人为官；能安定民众，就称得上仁爱，这样就能得到百姓拥戴）；

——“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处在高位要谨慎，要安于举止，不可轻率行动。辅佐的臣子有德行，天下的百姓就会顺应）；

——“予即辟，女匡拂予”（帝王如果有不正当的言行，辅臣要及时进行纠正）；

——“敬四辅臣”（帝王要敬重前后左右辅佐的大臣）；

——“女无面谀，退而谤予”（臣下不要当面恭维帝王，背后却又在说坏话）；

——“诸众諛嬖臣，君德诚施皆清矣”（对那些谄媚奸邪的臣子，只要君主的德行真正到了位，没有不能清除的）；

——“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帝王如果不能辨黑白，好人坏人一样任用，就难以做成什么事情）；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一

国之君英明有为，栋梁之臣贤良忠直，国家的各项事业才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王碌碌无为，胸无大志，臣下就会懈怠，各种事业就会败坏）；
.....

这一席话，君劝臣来臣劝君，有明示，也有启发；有忠告，也有警告；有期待，更有希望。这的确是有记载以来论述君臣较早较完整的记述。在此后的岁月里，君君臣臣，风风雨雨，多少云烟，多少故事？败亡者中，不论谁错谁过。就其因果而言，是否早已被舜与禹等人的这堂课所预见？世间万物，都有来去的规律及客观定位，亦有存在、运转的环境和条件。

说起“君臣第一课”的影响，还真是不可低估。在公元前479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圣人孔夫子去世了。随后，他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大，他的影响一天比一天深远。他和他的弟子们相处时的谈话录《论语》里凝结了他的思想。读几遍《论语》，人们就会发现，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的许多思想，与“君臣第一课”中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论语·八佾》中“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礼”与“敬四辅臣”，这个“忠”与“女无面谀，退而谤予”，何等的契合？比如《论语·述而》中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个《韶》，有说就是舜帝

的雅乐，在“君臣第一课”上演奏时，达到了“鸟兽翔舞”的境界。孔老先生不只是说《韶》，而是赞赏上古时代的文治的尽善尽美。比如《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舜有五臣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论语·颜渊》中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些说法，与“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与“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又何等的同义？《论语·季氏》中有“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阳货》中有“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些思想，在“君臣第一课”中也都可以找到源头。

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唐太宗与魏徵，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里最为经典的一对君臣关系了，一千多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在魏徵所理解和描述的君臣关系里，就显而易见地受到了这“君臣第一课”的影响。在经历了一段与太宗的不快之后（有人状告魏徵徇私，太宗派人暗查），魏徵与太宗有过一次谈心。他希望太宗要做舜帝那样的明君，而不要做商纣王那样的昏君，而自己则要做皋陶那样的良臣。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舜帝、大禹、皋陶在“谈心会”上说到的“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不仅如此，两个人还谈到了忠臣和良臣的区别。魏徵说：“臣闻君臣同



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未可知。”“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太宗问道：“忠、良有以异乎？”魏徵回答说：“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逢、比干，面折廷争，身祚国亡，所谓忠臣。”太宗听了十分高兴，立即“赐绢五百匹”。

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关键位置的人物之间，什么样的“标准尺度”在约束、激励着人们的言行，两千年间的事例变化多端，归纳叙述起来也颇为困难。“君臣第一课”揭示的理念，既“承前”，又“启后”，在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治天下之要，在于懂得民安、民富、民乐之理。因“说理”易、“走理”难，在中国历史上，昏君不少，乱臣亦常见，这些昏君乱臣在做坏事时可曾想到这“君臣第一课”上的“正道”吗？君有君规，臣有臣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君臣第一课”讲得明明白白，但是，历朝历代的“越轨者”依然是我行我素，将“祖训”丢得干干净净，又说明了什么？主观上人的素质修养固然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封建社会的体制上。